

# 四川會報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王雪梅 彭若木 著



# 巴蜀會館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王雪梅 彭若木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会馆/王雪梅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9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第4辑)  
ISBN 978-7-80752-349-9

I. 四… II. 王… III. 会馆公所—简介—四川省  
IV.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8381 号

·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  
四川会馆

王雪梅 彭若木 著

---

|      |                                                            |
|------|------------------------------------------------------------|
| 责任编辑 | 李 嘉 况正兵                                                    |
| 封面设计 | 张 科                                                        |
| 出 版  |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br>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br>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bsbook.com">http://www.bsbook.com</a>  |
| 发 行  | 巴蜀书社<br>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br>电话: (028) 84122206                           |
| 版 次  | 2009年3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138mm×203mm 1/32                                           |
| 印 张  | 5.5                                                        |
| 字 数  | 11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80752-349-9                                     |
| 定 价  | 15.00元                                                     |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张作哈

副 主 任：唐建军 张在德 王 伟

主 编：张在德

副 主 编：罗韵希 段志洪

编委会成员：唐建军 张在德 任 杰 梁清海

康济民 安 山 伍 文



# 总序

张中伟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所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四川



会  
馆

.....



## 目 录

|                        |           |
|------------------------|-----------|
| 总 序 .....              | 张中伟 (001) |
| 引 言 .....              | (001)     |
| 第一章 明清会馆概述 .....       | (003)     |
| 第二章 清代四川会馆 .....       | (019)     |
| 第三章 四川会馆的建筑艺术特色 .....  | (068)     |
| 第四章 会馆的集体象征与神灵崇拜 ..... | (111)     |
| 第五章 地域文化融合之地——会馆 ..... | (137)     |
| 结 语 .....              | (164)     |
| 主要参考文献 .....           | (169)     |
| 后 记 .....              | (171)     |



## 引 言

何谓“会馆”？按《辞海》之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会馆在中国出现，最初与商业有关。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京城长安就有外地人的邸舍，类似一种只接纳同乡人的“旅馆”，用以联络感情。东晋以后，中国黄河流域的汉人大批流徙江南，在建康等较大城市中，外地同郡同乡官员士绅，也常有聚会的固定场所。南宋时的杭州，除官绅外，还有同郡同乡商贾也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而真正被称为“会馆”的组织，是明清时同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会馆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背景。它兴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会馆的发达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明清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的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生和勃兴，先是



绅士会馆在明初产生，到明中叶以后，商业性会馆纷纷建立。明清流动性阶层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农、工、儒等各阶层。随着移民的经常化出现，移民性会馆到清康乾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清代四川地区，在全国区域移民和区域贸易浪潮激发之下，各式会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徙居新乡务农移民为主体的移民会馆，勃兴于集市场镇，穷乡僻壤。以离乡经商旅居客民为主体的工商会馆，迭兴于省府州县，大邑通都。积两个多世纪的运转，铸就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四川会馆文化。其匠心之笔，神来之功，演化生成厚重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毋庸置疑，四川会馆文化已成为全国会馆文化和巴蜀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的四川会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均列全国之前茅；对今天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著特色。





## 第一章 明清会馆概述

### 一、中国人的乡土观念

会馆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背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极大。人们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劳动、生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生活方式，甚至价值取向。在我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秦统一寰宇，车同轨，书同文，各区域文化呈趋同态势，形成主体文化。但文化的地方色彩仍很浓重。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无一例外都打上了本区域文化的印记。由于地区的差别，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差异巨大，人们更喜欢与自己有着相近习性与语言的人进行沟通。因而中国人对乡土的眷念、重视祖籍的观念，远较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为甚，千百年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之一。由乡土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在天南海北的人聚集的地方更显得突出和显眼，是克服人际关系障碍的有效办法。乡土观念对同乡人来说，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有感情的乡土观念，包含着爱与亲、怀念与依恋。特别是对于流浪他

乡、漂泊于异地的人们来说，同乡之间的深厚情感可以促使他们结成生活的联盟，共同面对在异乡出现的种种情况。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乡土情结的民族，“凡人皆问祖籍何处”。这种乡土情结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无形中增强了民众间的感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积淀中，籍贯观念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产生于人口的流动之中；而籍贯观念又源于乡土观念。乡土观念是支撑会馆产生存在的精神力量，会馆的产生与乡土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乡土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情结，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在人们心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而小农生产方式又将农民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耕与织是最为基本的经济活动，都与土地紧密相连。土地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不能任意搬动，因而农民必须定居，几乎世代相传。两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剧了乡土观念。两汉时期，统治阶级便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此后历朝统治者，尤其是隋唐以来的统治者，都害怕产生大量的流民，进而引发动乱，因此极为重视土地兼并问题。均田不仅是农民起义所要求的，也是许多地主阶级改革家所注意的，目的是让农民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些政策必然加剧乡土观念。

乡土观念又与宗族观念紧密相连。家族制度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伴随，它以宗族成员的安土重迁为前提。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习惯以族姓为单位，居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



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宗族以父系血亲为基础，有着同姓聚居和修谱联宗的习俗，基于宗族观念和习俗心理的需要，家族祠堂也日趋兴盛，各姓祠堂星罗棋布遍于各县四乡。乡土观念导致了人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圈子中，在这个圈子中，有固定的人，人与人之间有固定的关系。与此相适应，人们安土重迁，社会交往与流动异常缓慢。在一个家族里面，“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见稳固的家族关系与乡土观念的密切关系；“民无游惰，务农桑而轻贸易。士绝奔竞，尚文学而重婚姻”，这是传统乡土观念下的中国广大农村最生动的写照。

在家族制度之外，还形成了人们因群居而产生的村社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培植起来的乡土观念以及乡土观念的外延形态。千百年来，人们居住在同一个村落，以便照顾土地生产，人们对本乡土地和与此相关的山川风物等自然人文环境，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恋，甚至深化为一种感激和崇拜。同乡人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艺术欣赏，共同的节日庆典，以及共同的神道信仰，共同的方言口语等，形成了一方乡土人的共同心理意识与性格。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乡土与乡土观念是由当地人的自我认同和他认同构成的。研究表明，自我认同的乡土观念是与出生地、儿时的记忆、心灵的归属感、相同的价值判断等复杂的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自我对乡土的认同外，还有社会的认同，即他认同，这主要是由显性的行政区划、历史性的地域界限等因素构成的。但具体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地域的认同并不是

对出生地点或行政区划的认同，而是对这个区域的服饰、饮食、建筑、语言、节日、风俗、生产方式乃至于价值观念的认同，是对共同起源、共同荣誉、共同信仰的认同，是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承载着该地域文化的人——乡亲的认同，是对该地域文化的认同。正是鲜明的地域文化，使人们在茫茫大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心灵的特殊地域，这就是家乡、故土、故乡。这种乡土观念是自我和社会对一种地域文化的肯定、责任、依恋和强烈的归属。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他乡遇故知”被认为是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并列的人生三大幸事，“落叶归根”也就成为每个中国人难解的情结。而一个人出生地的唯一性、出生地域文化特色的独特性也是形成人们强烈的崇高感和归属感的原因之一，地域成为乡土符号与表征的主要原因。“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中国传统本位意识的生动写照。中国人的群体精神与大众平均数倾向作为一种强大的世俗力量影响着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习俗和风尚。会馆作为统一乡籍的人的团体，成为整合乡人的纽带，桑梓之情是会馆发轫的世俗内驱力之一。如《重修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对会馆的“笃乡情”即有记载：“桑梓殷情，与兹敦笃，秦人利赖者实惟有历年。”西秦会馆作为一个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被陕商们确认了下来。

民国建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这一民族观念深入人心，逐步取代了狭隘的地域、乡党、宗族观念，加之经济、教育的发展，社会关系、文化观念有所改变，会馆作用及其文化现象逐渐淡化。现代青年



已经很难理解“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乡”这句俗语的民俗学含义了。其中的“老乡”二字，就是隐于会馆背后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曾遍布全国各地的会馆就是老乡的代名词和代言人。远离乡党、宗族庇护的人可以在此争得自己的权益，浪迹天涯的游子可以在此感受到乡情的眷顾，排遣思乡的苦闷和孤独。从会馆这个窗口可以窥到中国民俗中的一些深层次的内涵。

## 二、流动性人口的增多和会馆的出现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安土重迁，尽管“父母在，不远游”，中华民族仍不失为一个流动性很强的民族。明清以来，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流动性阶层占了较大比例。随着流官制度、科举制度的变化发展，地域政治观念空前盛行；而工商业的发展，又使得商人们的足迹遍及各地。这样，明清以来，主要是官员、士人、商人这三种人流寓外乡。此外，明清以来的移民风潮几乎席卷了农、工、儒等各个阶层。人口流动意味着走向陌生的环境。向外发展就要分占别人的资源，这势必导致诸多矛盾。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协调矛盾，如何求得长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长，都要求有一种务实的解决途径；在移民集中的地区，官方行政机构或尚不完善，或付之阙如，土客矛盾、客客矛盾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从流动性人口本身来看，身处异地的陌生环境，面对与出生地区迥异的方言、风俗习惯，漂泊人顿生出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人地生疏，再加上文化的隔膜，使他们倍感孤寂。他们渴望心灵的交流，渴求

归属于某个群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但由于地区间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他们很难在旅居和移民所在地领略到文化心理上的亲切感。为了从思乡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在与同乡人的交往中获取文化的认同，无疑是最佳、也是最现实的方式，桑梓之情成为旅外同乡人最易接受的纽带。会馆这种主要以地缘为纽带的基层社会组织因最贴近他们的心理需要便具有了广泛的发展前景。

明清以来会馆这种民间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它以乡土为纽带，以传统优良的道德观、价值观为指导，以相互定期与不定期的聚会、娱乐及彼此的互律为活动方式，力图建立起一种和谐稳定，以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万变的社会秩序。会馆不仅林立京师街区，而且其他通都大邑，甚至府、县、乡镇也有分布。从全国范围来看，会馆构成复杂，种类较多，按照吕作燮先生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王日根教授在《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中，也将会馆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种。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明清时期，随着社会上流动性人口的增多，为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会馆兴盛的背景是同市场机制、人口迁移、科举制度密不可分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为异地任官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地域政治观念自秦朝起就露其端倪。历经千百年

的发展，至唐宋之际，传统社会发生了重要变革，宋朝更广泛地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引起了人口流动和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动。明清以来，由于政治相对承平，因科举制度和官吏异地就任制度而激发起来的地域政治观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在官员荟萃的京师发育成长起来，而表现形式就是会馆的设立和修建。明清两朝，北京为京师之地，是全国政治、商业中心，加之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各地商人、学子以及在京待命的官员云集，为方便这些人的食宿，明末即开始大量兴建会馆。清代，会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500处以上。各省的官员，分别在北京建造会馆，作为同乡官绅商贾聚会、联络、商议的固定场所，还设有办事机构、人员，订有规章制度等。在京城会试期间，接纳同乡贫寒举人住宿；或对本省人士、事务进行帮助等等。史载最早出现的会馆是在明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翻开了明清时期会馆建设的第一页。据民国《芜湖县志》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1403—1424）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

俞谟（安徽芜湖人）在永乐年间，做过南京户部主事，后调至北京为工部主事。他于明永乐年间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买地建造旅舍，以作亲朋寓居或涉足商界活动洽谈之所。俞谟后来辞官时，将产业交给了同籍的京官晋俭，这样就形成了同籍人共同聚会的场所——芜湖会馆，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家馆。早期会馆体现的是会馆最直观的意义，即集会之馆舍，为同乡京官聚会的场所。



后来数十年间，各省在京师纷建会馆成为时尚。这些会馆大体有三类：一是为官绅乔寓之馆，二是既为官绅又为科举士子提供住居的馆所；三是专门为赴考士子住读之所。一、二两类在北京内城，第三类建在京师外城。而官绅、科举兼顾的会馆尤其昌盛，会馆服务于科举一时间蔚为风气。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但是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是负担不起的，他们中不少人在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到处受白眼和冷遇。因此，举子们迫切企盼解决到京后的食宿问题。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官吏也非常渴望来自自己家乡的人能科举及第以便入朝为官，他们有的开始把官绅会馆转为安顿来京应试子弟之理想场所，每逢春闱秋闱时他们便搬出会馆，为应试子弟提供住所、饮食之便利。另一方面，专门服务于科举的会馆也应运而生。“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做“试馆”。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废除，这类试馆功能丧失。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以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祭祀乡贤或燕集，常集于会馆，“敦亲睦之谊，叙